

新雪叩问旧窗棂

■ 包元安

我放下手中的书，侧耳细听。这回窗外的声音清晰了些，沙沙的，带着些微的潮意。是下雪了。今冬的第一场雪，竟是这样不声不响地来了，像个怯生生的远客，先用指节在窗上轻轻叩两下，探问屋里是否还住着故人。

这雪声是认得路的。它一来，便在各处敲打出不同的音韵。落在院里那棵老槐树的秃枝上，是簌簌的、干爽的，像春蚕在嚼着最后的桑叶；落在屋檐的青瓦上，声音便脆了些，叮叮当当的，细碎而遥远，仿佛许多小小的玉磬在云里敲着；待到积得厚了，声音便哑了，闷闷的，像是大地在棉絮底下沉沉地呼吸。最妙的还是雪籽儿打在窗棂上的声响，簌棱棱的，清凌凌的，像是无数晶莹的碎米，一把把撒在陈年的

宣纸上。这声音不独我用耳朵听见，连脸颊也觉着了那透过窗纸漫进来的、沁人的寒意。

这簌棱棱的声音，像一把素净的钥匙，只管往记忆的锁孔里轻轻一探，那扇尘封的门便“吱呀”地开了。

这样的雪天，祖母是不许我们窝在屋里的。她会说：“去，听听雪落下是什么声儿。”我们便猴子似的蹿到院中，张开手，仰起脸。雪落在掌心，是无声的；落在眉梢，是微凉的。堂弟嚷：“我听见了！是‘噗’的！”堂妹叫：“不对，是‘嘶’的！”祖母坐在廊下，靠着火盆，眯着眼笑。那时只觉得好玩，如今想来，祖母要我们“听”的，哪里是声音呢？她要我们听的，是整个冬天沉静而温柔的魂灵。那是一种怎样活泼的静

寂啊？

窗户隔着两个世界。窗外的“今”，是车马人声都叫雪吞没了的白茫茫一片大地，万物都简化成了最单纯的轮廓，像个删繁就简的梦。窗内的“昔”，却在这雪声的叩问下，渐渐鲜活、温热起来。我想起那些有月亮的雪夜，院子里明晃晃的，如同白昼，却又比白昼多了一层梦一般的银辉。我和弟弟舍不得睡，趴在窗台上，看月光将窗棂的格子，一方方，整齐地印在屋内的砖地上，那影子里仿佛也盛着雪光，清亮亮的。我们便在这光影里猜谜语、讲故事，或是静静地听着屋外寒雀偶尔的一声啼叫，划破雪夜的寂静。那叫声带着些许金属的颤音，落在雪上，似乎能溅起星星点点的回响。

杜牧在《初冬夜饮》中写道：“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这两句诗，没来由地浮上心头。我这里没有梨花，也没有栏杆，只有这老旧的窗户。但那份景致易逝、人事变迁的惘然，却是相通的。新雪年年依旧，可当年一同听雪的人，早已各奔东西了。这窗户仿佛成了时光的界河，我站在这边，望着那边的旧影，听得见，却回不去。

雪不知何时稀落了，终于停了。万籁俱寂。先前被雪声“叩醒”的热闹记忆，也仿佛一群玩倦了的孩子，又悄然退回到时光的深处，歇息去了。只有窗棂上，新雪的微光映着，静静地，像一声未来得及说出口的问询，又像一个圆满的、无言的回答。

夜真静啊。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孙世华 摄

当学生和我同名

■ 陈雄

几年前，我接手一个新班级，翻开学生名册，发现竟有一个学生和我同名——陈雄，一字不差！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大了，全身感到莫名的不自在。

时间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全班几乎每个学生都被我点名发言过了，唯独对那个和我同名的学生，我一直像对待一颗地雷一样，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不敢点他。而“陈雄”也仿佛知道自己的名字无意“冒犯”了老师，上我的课时，我注意到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看黑板，更谈不上看我了，他一定也意识到我不点他发言的原因，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了，他交上来的作文，书写潦草，语病百出，一看就是敷衍完成的。

一天，下课时，我正收拾着备课本，准备出教室，突然，教室里响起一声呼唤——“陈雄”，我先是诧异，哪个同学这么大胆，直呼我名，等扭过头时，我才醒悟过来，这位学生是在叫他同学的名字，学生见我回头，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而他——学生陈雄也面红耳赤了。虽然这时，我已明白这个同学不是在叫我，但猛地这么在教室里喊一声，还是令我不自觉地尴尬。

理智告诉我，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与其躲避尴尬，不如直接鼓起勇气面对“陈雄”。

那天上语文课，“陈雄1”我终于大声地叫了“他”的名字，当然也是“我”的名字，我让他分析刚刚讲过的那首诗好在哪里。学生陈雄没想到我会点他回答问题，惊慌而迟疑地站起来，支支吾吾了半天，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像犯了大错一般垂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屏气敛声地看着我，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看我这场戏如何收场。

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我说：“陈雄同学，你肯定是认为这首诗太好了，好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是吗？”学生陈雄抬起头，红着脸，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如遇救星似的连连点头。同学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如释重负地让他坐下。

那天课外活动时，我把学生陈雄叫到办公室，和他谈心，告诉他全国同名的人千千万万，据说，某省叫“张丹”的人就有3万多个。他面露惊讶之色，我顺势引导，班主任又不像封建时代的皇帝需要避讳，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不必在意。

我还给“陈雄”讲了我名字的来历。当年，我们三兄妹的名字，都是我大舅所赐。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大舅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语——雄伟壮丽，他一直对即将到达这个世界的外甥充满热望。我是长子，名字以“雄”相称，然后是弟弟，以“伟”相称，接着是妹妹，取了一个“丽”字。

“陈雄”入迷地听着我的故事，开心地笑了。这时，他整个人看着都放松了，我又叮嘱他一定要摆脱和老师同名的“阴影”，随时做好被点名的准备。

一连几天，我都频繁地点学生陈雄发言，他也慢慢有了信心，一次比一次回答得好，作业书写明显工整了，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

后来，“陈雄”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大一的暑假里，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陈老师，如果您那天不点我回答问题，也许我会一直讨厌这个名字，甚至放弃自己，而现在，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喜欢我自己……”

听风穿过枯枝

■ 孙志昌

冬日里，我最爱听的就是风穿过枯枝的声音。

午后，屋里很静，暖气片散发着微微的热气，让人有点昏昏欲睡。我正对着一页书发愣时，窗外响起了声音——先是在远处，像是有人在空旷的田野上叹了一口气，然后在近处，像是擦着院角的老槐树而来。

槐树的枝丫交错着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风一来，就在这枯瘦的骨骼间寻到了路迹，那不是呜咽，倒像是极细极韧的丝线，从极高之处抛下来，在枝枝杈杈之间来回拉扯，发出一种尖锐又不失圆润的“咻——”声，这声音并不刺耳，反而有一种清冽的质感。我的目光从书页上移开，投向那个我看不见的演奏者。

风很顽皮，它不会在某个地方待很久，刚在槐树上歇息一会，又跑到墙外那片竹林里去了。竹叶还没有全部脱落，但已经变黄蜷缩起来，风吹过来，不再是夏天那种清爽带水汽的声音，而是“窸窸窣窣”的，干湿又嘶

哑，声音零碎又密集。

最令我心安的是后院那几棵老松树的动静，北方冬天里难得有一点的绿意便是松树，虽说绿得深，几乎要黑了，风大时摇动它们的声音却不一样，不是尖哨也不是碎响，是一种浑厚的、连绵不断的“呜——呜——”，像是从深潭底下浮上来的水波，一叠一叠地慢慢展开来，这就是人们说的“松涛”。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心里就踏实些，觉得天地间还是有些实在的东西撑着，不会全被这股凛冽的冬意吞没掉。

这风声，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也是这样的冬天，我缩在爷爷的怀里，在老家朝北的堂屋里坐着，屋瓦上有风跑过，发出各种各样的响声。我那时小，怕得要命，就把头往爷爷的棉袍里钻，爷爷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怕什么？那是老天爷吹笛子呢，它给槐树吹一个调儿，给竹子又吹另一个调儿，它忙得很，哪有工夫吓唬你？”

看懂的书页，阳光下痕迹闪闪发光。

看着邻居小孩写写画画，我心中泛起一种淡淡的惆怅。这样投入地写，但过一两个小时之后，一阵风、一层新雪或者明日的太阳就会将所有的开心与烦恼都抹去了吗？去年、前年，他大概也这样写过、画过、见过，雪化后一切痕迹都会消逝，但仍然乐此不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趣，是孩子的庄严仪式。

很多大人早已不干这样的傻事了。我们更想留下一些恒久的东西，立碑、著书，希望可以抵御时间的流逝。看着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心里也会涌起一丝怜悯。现在，这片静谧的雪光中，我想起那个想要成为“大人”的孩子，还有他转瞬即逝的字迹，反而比我们这些忙碌奔波的大人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苏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鸿鹄雪泥留爪印是偶然，它自己飞向何方并不明确。孩子的字画，也不正是生命偶然的指爪么？他计较雪地太阳明天是否还在吗？并不。他在意的，是“写”与“画”那

一刻。一笔画下，雪层陷落，心思显现的刹那，快乐便圆满了。至于存留，是风雪与时间的事，与他无关。

天色变暗，雪地的白色光芒也变成了幽蓝色。孩子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雪沫，心满意足地回望自己的作品，然后一跳一跳地消失在单元门洞中，没有一点留恋。那片雪地上，“大人”是黑色的，太阳在发光，成堆的圆圈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是一个易碎而美丽的梦。

我仍然站在那里，没有靠近。明早打开窗户的时候，又会是一片洁白的平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孩子今夜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在梦中或许会有一片比月光更亮的雪地，以及一个歪扭却光芒万丈的太阳。

有些存在并不是为了对抗消逝而存在的。雪地终将空无一物，但是那双曾经挥动过的手和那顶红色的毛线帽所点亮的那个下午却一直保存在记忆中的一角，如同一粒琥珀一般静静地沉睡着。

雪又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轻轻覆盖在天真的字迹上。天地用最温柔的方式读过一页之后就合上了。

母亲学会坐地铁

■ 詹阳

母亲第一次站在广州地铁站里，眼神里有些许恍惚。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她身边掠过，她下意识往我身边靠了靠，像许多年前我初上学时紧挨着她的模样。

“你教我怎么坐地铁，”她说，“下次我自己去你单位找你，不耽误你工作。”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在我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交通工具，于她而言竟是陌生的。她一直生活在故乡的小县城里，出远门基本是坐长途汽车。如今，为了不给我添麻烦，她主要学习如何坐地铁。

从买票开始教起，我示范着在自动售票机上的操作，她的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眼睛眯成一条缝。“先选线路，再选站点……”我话音未落，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又摸出一个小本子。“你慢点说，我记一下。”那双布满细纹的手，曾经熟练地穿针引线、腌制菜干，此刻却略显笨拙地握着笔，一笔一画地记下“3号线—体育西路—转1号线”。

我教她用手机扫码进站。她学得极认真，每个步骤都要重复好几遍。“这个二维码会不会突然消失？”“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教我系鞋带，也是这样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

真正进到站台，她被呼啸而来的列车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臂。车厢门打开，人潮朝着我们往里走。我护着母亲找了个角落站好后，她才松了口气，手还紧紧攥着那个记满笔记的小本子。

“下一站是体育西路，”我提醒她，“我们要在这里换乘。”她立刻紧张起来，踮起脚望向车门上方的线路图。“记住了，3号线转1号线。”她喃喃自语，像是要把这句话刻进心里。

第二次实践时，她坚持要独自操作。我看见她在售票机前研究了很久，掏出现金时手有些发抖。好不容易买到票，过闸机时又把票贴错了位置。后面有人不耐烦地咂嘴，她的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站在不远处，强忍着不上前帮忙——这是她必须跨越的一步。

当她终于成功通过闸机，回头看我们时，眼角浅浅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多年前我学会骑自行车时，她在身后同样欣慰的笑容。

第三天，她真的要独自出发了。前一天晚上，她把那个小本子反复看了又看，嘴里念念有词：“3号线、体育西路、1号线、公园前……”清晨送我出门时，她故作轻松：“放心，我都记牢了。”

一整个上午，我都在担心。手机就放在旁边，生怕错过她的电话。中午11点多，母亲的电话打来了，不是问我怎么换乘，而是一句“我到了”。电话那端，母亲语气平静，可微微颤抖的声音出卖了她的激动。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路上，她换线时坐反了方向，在体育西路站迷了路，是靠着不断地问工作人员才找到正确的站台。可这些曲折，她只字未提，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把从家带来的保温盒打开——里面是她起大早地的汤。“趁热喝。”她说，语气平常得仿佛这一路的曲折不值得一提。

那个午后，我和母亲待在单位旁边的公园里，她安静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我把汤喝完。我忽然明白，这两个小时的地铁旅程，对她来说不是简单的换乘移动，而是一位母亲如何穿越陌生的城市、准确无误地找到她的孩子的过程。

从那天起，母亲每次来广州都会坐地铁来看我。她不再需要小本子了，甚至学会了看电子站牌，懂得了避开高峰时段。有时，我下班走出大楼，会看见她早已等在那里，手里提着家乡味道的吃食。我们并肩走向地铁站，她偶尔会指着某个出口说：“从这边走近些。”语气里带着小小的自豪。

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纵横交错，曾经是母亲的困境，如今却成了她表达爱的路径。